

政治經濟學參考資料

(僅供內部參考)

一九五五年八月

目 錄

中央七屆二中全會（新華社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石家莊電）

（見參考資料第167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舉行第四次全體會議的公報（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八日）

（見參考資料第54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公報（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

附：爲實現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決議而奮鬥（一九五五年四月五日「人民日報」社論）

（以上兩篇見參考資料第168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

（見參考資料第178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周恩來報告共同綱領草案起草的經過和綱領的特點（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見參考資料第7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李富春：中華人民共和國怎樣發展工業建設（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見參考資料第169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李富春：關於與蘇聯政府商談蘇聯對我國經濟建設援助問題的報告〔摘要〕（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

（見參考資料第186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關於中蘇舉行會談的公報（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

（見參考資料第170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人民日報」社論）

（見參考資料第174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發展重工業是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中心環節（一九五四年三月三日「人民日報」社論）

（見參考資料第181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充分發揮機械工業在經濟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社論）

（見參考資料第177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必須在發展重工業的同時相應地發展其他經濟事業（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人民日報」社論）

（見參考資料第188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時刻注意提高我國工業發展的速度（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社論）

（見參考資料第182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生活的改善必須服從於生產的發展（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

（見參考資料第141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充分發揮技術人員在國家工業化建設中的作用（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社論）

（見參考資料第185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大力加強經濟保衛工作（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社論）

（見參考資料第63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鞏固工農聯盟是實現總路線的保證（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社論）

（見參考資料第12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鄧子恢：中國農業走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見參考資料第180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鄧子恢：農村工作的基本任務和方針政策（一九五三年七月二日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見參考資料第184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廖魯言：關於一九五四年農業生產基本情況和當前農業增產措施的報告（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六次會議批准）

（見參考資料第173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程子華：爲進一步開展城鄉物資交流，促進以互助合作爲中心的農業

增產運動，支援國家工業化而奮鬥（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臨時理事會工作報告）

（見參考資料第175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供銷合作社必須貫徹為農業生產服務的方針（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

（見參考資料第171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積極開展信用合作是當前農村工作中一項重要任務

（見參考資料第179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程子華：關於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若干問題（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在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第三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上的報告〔摘要〕）

（見參考資料第176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必須重視手工業（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社論）

附：湖北省手工業代表會議

（以上兩篇見參考資料第183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積極領導手工業者走合作化的道路（一九五四年四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社論）

（見參考資料第187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政務院第二百二十三次政務會議通過）

附一：李維漢：關於「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的說明（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

附二：把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業有步驟地改變為公私合營工業（一九五四年九月六日「人民日報」社論）

（以上三篇見參考資料第172號，中國人民大學版）

參考資料

第 167 號

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

——新華社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石家莊電——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第二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在石家莊附近舉行，會議經過了八天，業已完滿結束。全會到中央委員三十四人，候補中央委員十九人。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缺席者二十人。毛澤東主席向全會作了工作報告。全會批准了一九四五年六月一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認為中央的領導是正確的。全會批准了由中國共產黨發起，並協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民主人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全會並批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澤東主席的聲明及其所提八項條件以爲與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與軍事集團舉行和平談判的基礎。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着重地討論了在現在形勢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的問題。全會指出：從一九二七年中 國大 革命 失敗 到現在，由於敵我力量的懸殊，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奪取城市。黨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團結了廣大的勞動人民，執行了這個用鄉村包圍城市的方針；歷史已經證明這個方針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並且是完全成功的。但是，採取這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從新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毫無疑問，城 鄉 必須 兼顧，必須使城市和鄉村、工人和農民、工業和農業密切地聯結起來。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如果這樣想，那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黨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全會指出：我黨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領導城市人民進行勝利的鬥爭，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在領導

城市人民的鬥爭時，黨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羣衆，爭取知識分子，爭取儘可能多的能够和共產黨合作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站在一條戰線上，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反動派和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鬥爭，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全會認為：管理和建設城市的中心關鍵是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第一是公營企業的生產，第二是私營企業的生產，第三是手工業生產。城市中的其他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建設工作，工會工作和各種民衆團體的工作，治安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都應當爲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這一個中心工作而服務。全會號召全黨同志用全力學習工業生產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學習和生產有密切聯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並且發出警告說：如果我黨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儘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麼，黨和人民就將不能維持政權，就會站不住腳，就會要失敗。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指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中國共產黨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作爲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同時，也要求中國共產黨團結儘可能多的能够與共產黨合作的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以便共同打倒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從而創造條件使中國有可能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爲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爲社會主義國家。二中全會號召全黨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立與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在這個問題上，既要反對無原則的遷就主義的態度，又要反對妨碍黨與黨外民主人士團結的關門主義或敷衍主義的態度。

鑒於具有偉大國際意義的中國革命的全國勝利，不久就要到來，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特別警戒全黨同志不要驕傲自滿，不要被人們的無原則的捧場所軟化。全會指出：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是奪取全國革命的勝利只是工作的第一步，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

更艱苦。全會號召全黨同志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鬥的作風，以便在打倒反革命勢力之後，用更大的努力來建設一個新中國。全會認為：中國的經濟遺產雖然是落後的，但是中國人民是勇敢而勤勞的，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和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加上以蘇聯爲首的強大的全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綫的援助，中國經濟建設的速度，將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當地快的，中國的興盛是可以即日成功的。對於中國經濟復興的悲觀論點，沒有任何的根據。

（選自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北平版）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印刷

1956年7月

參考資料

第54號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舉行 第四次全體會議的公報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於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舉行了第四次全體會議。出席全會的正式中央委員三十五人，候補中央委員二十六人，正式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因病因事缺席九人。列席全會的有黨、政、軍和人民團體的主要負責同志共五十二人。毛澤東同志因在休假期間沒有出席全會。在全會上，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同志受黨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的委託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屆第四次中央全會的報告」，朱德、周恩來等四十四個同志作了重要的發言，經過詳細的討論，全會一致通過了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建議而提出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並一致通過了批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在一九五四年年內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決議。

劉少奇同志受黨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的委託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屆第四次中央全會的報告」和全會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其要點如下：

劉少奇同志的報告共分三個部分：一、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關於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三、為增強黨的團結而鬥爭。

劉少奇同志在講到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時指出：從一九五〇年六月黨的三中全會到現在，已經過了三年半，在這個期間，黨的中央政治局以毛澤東同志為首領導着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了巨大的工作。黨在這時期的工作，基本上是以七屆二中全會和三中全會的

決議爲指針的。在這期間，黨的中央領導着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了抗美援朝運動、和平解放西藏、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社會改革運動。同時，在工廠和農村中進行了增產節約、勞動競賽和愛國增產運動以及生產上的許多改革工作，大大地提高了工農業生產。主要工農業產品，在一九五二年均已超過或接近我國過去歷史上的最高生產水平；交通運輸和商業均有相應的發展；國家財政的收支一直保持平衡，市場的物價一直保持穩定；人民的購買力已有提高，人民的生活已有改善。全黨和全國人民很好地實現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所指示的方針，爭取了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使我國在一九五二年勝利地完成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一九五二年全國工農業生產總值爲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一百七十，其中現代工業產值則爲二點六倍。現代工業的產值，在一九四九年只佔工農業總產值的百分之十七，至一九五二年已增至百分之二十八左右。在進行經濟恢復工作的同時，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獲得了重要的增長。他繼續指出：一九五三年，我國已進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並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確定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是必要的和適時的。在這條總路綫提出以後的幾個月中，黨向全體黨員幹部和全國人民進行了規模巨大的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綫的宣傳和教育工作，使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獲得了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熱誠擁護，使社會主義的思想在國內樹立了壓倒一切的優勢，使資本主義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批判。在黨的總路綫的鼓舞下，我們勝利地完成了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第一年即一九五三年的任務，在工業方面，全國工業生產總值預計可完成年度計劃的百分之一〇六，較一九五二年約增長百分之三十四；在基本建設方面，中央各工業部可完成百分之九十六點八；在農業方面，去年有些地方雖然發生了相當嚴重的災害，但糧食的總產量仍略高於一九五二年的水平。一九五三年冬季，爲了保證國家糧食的供應和市場物價的穩定，爲了克服農民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並與資產階級的反限制的活動進行鬥爭，已開始由國家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政策，並展開了巨大的工

作。他又指出：我們在文化教育工作，民主的建政工作，外交和國際活動方面以及其他許多方面都進行了巨大的工作。團結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統一戰綫工作有了重要的進步。劉少奇同志在敘述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在抗美援朝鬥爭、在經濟戰綫上以及其他各方面工作中的偉大勝利時，他着重指出這是與偉大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對我國的無私的援助以及世界愛好和平人民對我國的深厚同情分不開的。接着他又說到：三中全會以來，黨內教育，幹部學習，整黨建黨工作也獲得了不少成績。現有黨員六百五十萬人，黨員成份已有改善，黨員的覺悟程度和黨的戰鬥力已有提高。在指出了三中全會以來黨已獲得上述巨大成就的同時，他又指出了黨在各項工作中存在着的缺點和錯誤，並認為：及時地發現和糾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乃是我們各項工作獲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要求全黨始終保持謙遜態度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為不斷糾正和克服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奮鬥。

劉少奇同志在講到關於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時指出：國家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勝利完成是實現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的一個決定性的關鍵；因此，中央政治局請求四中全會批准在一九五四年年內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以討論國家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綱要及其他有關各項問題。

劉少奇同志在講到為增強黨的團結而鬥爭時說：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黨的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提出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建議。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毛澤東同志的建議，並根據他的建議起草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提交七屆四中全會討論。

全會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內指出：黨的團結，工人階級的團結，勞動人民的團結，全國人民的團結，是革命勝利的基本保證。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基本原理之一。中國共產黨依靠全黨的團結，領導着全國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現在中國的革命事業還沒有最後完成，在國內人民的敵人還沒有完全消滅，在國外還存在着帝國主義的包圍。現在中國正處

在社會主義革命即社會主義改造的階段，我們要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一個比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更深刻更廣泛的革命，包含着極複雜極尖銳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一方面，外國帝國主義，決不會袖手旁觀；另一方面，國內那些已經被打倒的階級決不會甘心於自己的死亡，那些將被消滅的階級也決不會沒有反抗，他們中的堅決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國帝國主義互相勾結起來，利用每一個機會來破壞我們黨和人民的事業，企圖使中國革命事業歸於失敗，使反動統治在中國復辟。帝國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壞我們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壞我們黨的團結，並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我們黨內產生過陳獨秀、張國燾，蘇聯黨內產生過貝利亞，這樣重大的歷史教訓表明，敵人不但一定要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而且曾經找到過，在今後也還可能找到某些不穩定的、不忠實的、以至別有企圖的分子作爲他們的代理人。

劉少奇同志在報告中說：中央政治局認爲應當嚴肅地指出：對於黨最危險的，乃是敵人在我們黨內製造分裂，製造派別活動，利用某種派別（如果敵人真能造成一種派別的話）作爲他們的代理人的危險；因爲敵人和我們同樣明瞭這個真理：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所以全黨千萬不要以爲力求捲土重來的帝國主義者和堅決抵抗社會主義改造的資產階級分子要在我們黨內製造分裂、尋找代理人是什麼特別奇怪的事；不是的，如果敵人不想分裂我們，不想利用我們隊伍裏面的分歧，不想利用我們隊伍裏面的不忠實、不穩定以至別有用心分子作爲代理人，那才是真正奇怪的事。因此我們的任務決不是用萬事大吉的精神來解除全黨的警惕性，而應當是相反，應當用階級鬥爭的現實和歷史的教訓來提高這種警惕性，使全黨處於清醒狀態，並且用增強黨的團結的實際行動來答覆敵人的陰謀。

全會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對我們黨的內部情況作了全面的分析。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在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正確的組織路線的基礎上，經過種種犧牲奮鬥，

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央的統一領導和全黨的團結一致，這個團結又由於及時地正確地克服了危害黨的團結的敵對活動和錯誤傾向而日益鞏固，終於使黨成爲一個不可戰勝的力量。但是，我們黨現在還採取着和資產階級聯合的政策，小資產階級還像汪洋大海似地包圍着我們，我們的黨很大，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還很不够，一部分幹部中的思想政治情況還相當複雜；同時，我們黨內一部分幹部甚至某些高級幹部對於黨的團結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對於集體領導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對於鞏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特別是由於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黨內一部分幹部滋長着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爲工作中的若干成績就衝昏了頭腦，忘記了共產黨員所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爲天下第一，只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所有這些情況都說明，當此我國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緊要歷史關頭，有極大的必要來喚起全黨同志更加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強黨的團結。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而破壞黨的團結就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幫助敵人來危害黨的生命。決議要求全黨的同志都以高度的自覺來愛護黨的團結，爲增強黨的團結而努力。特別是中央委員會和省（市）委員會以上的負責同志和武裝部隊的高級負責同志，對於黨的團結的必要和自身責任的重大都應有很高的自覺，並應在黨內作很大的努力和必要的工作。

爲此目的，全會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中規定了各項增強黨的團結的具體辦法，同時又指出：黨的團結必須是也只能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團結，在正確的政治原則和正確的組織原則的基礎上的團結。爲了增強黨的團結，不但不允許縮小黨內民主和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必須保證充分發展黨內民主，充分發展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能避免的缺點和錯誤，使黨的事業得到順利的進展。對於黨員的缺點或錯誤進行批評，應當區別不同的情形，採取不同的方針。對於那種有意地破壞黨的團結，

而與黨對抗，堅持不改正錯誤，甚至在黨內進行宗派活動、分裂活動和其他危害活動的分子，黨就必須進行無情的鬥爭，給以嚴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時將他們驅逐出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維護黨的團結，才能維護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但是對於那種具有在性質上比較不重要的缺點或犯有在性質上比較不重要的錯誤的同志，或者對於那種雖然具有嚴重或比較嚴重的缺點、犯有嚴重或比較嚴重的錯誤，但在受到批評教育以後，仍能把黨的利益放在個人的利益之上，願意改正並實行改正的同志，應當採取「與人為善」、「治病救人」的方針。對於他們的缺點或錯誤必須按照具體情況進行嚴肅的批評或必要的鬥爭；但是這種批評或鬥爭應當貫徹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或鬥爭達到團結的目的」，不應當不給他們改正的機會，更不應當故意將他們的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比較不重要的缺點或錯誤誇大為系統的、嚴重的缺點或錯誤，因為這種態度就不是從團結出發，就不能達到團結的目的，就不利於黨。

全會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最後指出：黨的中央委員會和省（市）委員會以上負責同志以及武裝部隊的高級負責同志的團結，是全黨團結的關鍵。在增強黨的團結的事業上，這些負責同志擔負着主要的責任。決議號召這些同志並經過這些同志教育全黨幹部以身作則，同心同德，「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以便團結整個工人階級，團結全體勞動人民和全國人民，為戰勝內外敵人的任何破壞陰謀，保證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事業的勝利而奮鬥。

（錄自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印刷

1955年5月

參考資料

第 168 號

目 錄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

公報（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 1

附：爲實現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決議而奮鬥..... 9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黨的 全國代表會議的公報

——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召集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六十二人和全國黨組織所選出的代表二百五十七人。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的議程有下列三項：（一）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和關於這個計劃的報告；（二）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三）關於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

會議的第一日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致開幕詞，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陳雲同志代表中央委員會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員會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

會議接着對這兩個報告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除分組討論外，全體會議的討論進行了八天，在全體會議上發言的有一百人。中央委員會

政治局委員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等同志都在會議上作了重要的發言。會議在討論中對黨的工作和國家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並揭露了工作中的許多缺點。整個會議充滿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顯示了全黨的思想更加一致，在這個基礎上黨比以前任何時期更加團結和統一。發言的同志一致同意陳雲、鄧小平兩同志的報告。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發言者根據過去兩年工作的成就和經驗，根據各個地區和各個部門的情況，一致認為這是一個偉大的和切實可行的計劃，全黨應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兢兢業業，克服困難，努力增產，厲行節約，為它的完成和超額完成而奮鬥。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問題，發言者揭露了高崗和饒漱石的各種反黨反人民的罪行，一致主張開除他們兩人的黨籍，並指出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鬥爭是黨的歷史性的勝利。

會議在最後一天一致通過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和關於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並根據後一決議選出了以董必武同志為書記的中央監察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四月四日舉行了第七屆第五次全體會議，批准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所通過的三項決議和所選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人選。五中全會委托中央政治局根據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討論，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作適當的修改，然後提交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予以審議和通過。

此外，中國共產黨七屆五中全會補選了林彪、鄧小平兩同志為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 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通過——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同意中央委員會提出的關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內容和陳雲同志代表中央委員會所作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認為這個計劃是實現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綫的一個重大步驟。全黨同志必須在中央的領導下，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羣衆，兢兢業業，克服困難，努力增產，厲行節約，爲完成和超額完成這個計劃而奮鬥。

全國代表會議建議中央委員會根據這次會議討論的意見，對五年計劃草案進行必要的修正，並在修正以後，提交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予以審議和通過。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通過——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聽了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員會所作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對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第七屆第四次全體會議以後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問題所採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

高崗的反黨活動已經有相當長久的歷史。根據一九五四年二月召開的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前後揭發出來的事實證明，從一九四九年，高崗就以奪取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爲目的而進行陰謀活動。他在東北和其他地方製造和散布很多污蔑黨中央和吹噓自己的謠言，在同志中挑撥離間，煽動對於黨中央領導同志的不滿，進行分裂黨的活動，並且在這種活動中形成自己的反黨宗派。高崗的反黨宗派在東北地區的工作中違反黨中央的政策，竭力降低黨的作用，破壞黨的團結和統一，把東北地區當成爲高崗的獨立王國。高崗在一九五三年被調到中央工作以後，他的反黨活動更爲猖獗。他甚至企圖煽動在軍隊中工作的黨員支持他反對黨中央的陰謀，並爲此而鼓吹一種極端荒謬的「理論」，說我們的黨分爲兩個：一個是所謂「根據地和軍隊的黨」，另一個是所謂「白區的黨」，說黨是軍隊創造的，他自認爲是所謂「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人，並自認爲應當掌握主要的權力，因此黨中央和政府都應當按照他的計劃改組，他自己在現時應當擔任黨中央的總書記或副主席，並擔任國務院總理。在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向反黨

分子提出嚴重警告以後，高崗不但不向黨低頭認罪，反而以自殺來表示他對黨的最後的背叛。

饒漱石是高崗反黨陰謀活動的主要同盟者。現在已經完全查明：饒漱石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五三年的十年間曾多次爲了奪取權力而在黨內使用可恥的欺騙手段。他在華東工作期間，在城市和農村中竭力採取向資本家、地主、富農投降的右傾政策，並違抗中央鎮壓反革命的政策而竭力保護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三年他被調到中央工作以後，認爲高崗奪取中央權力的活動將要成功，因此同高崗形成反黨的聯盟，利用他的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職務發動以反對中央領導同志爲目的的鬥爭，積極進行分裂黨的活動。從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到現在，饒漱石從無悔改之意，並且仍然繼續採取向黨進攻的態度。

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陰謀活動，以及這一活動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一九五三年達到頂點的事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歷史的社會的根源的。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活動是我國階級鬥爭形勢複雜化和深刻化的反映。在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發展引起了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帝國主義的極大的仇視；美帝國主義正在繼續侵佔我國的領土台灣，並積極利用台灣和其他軍事基地對我國進行顛覆活動和準備侵略戰爭。在另一方面，國內的反革命殘餘分子和資產階級中堅決反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反動分子，隨着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進展，也正在加緊他們的反革命復辟的陰謀。但是我們的敵人知道，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勞動人民中間享有無限的威信，是我們國家的領導力量，只要中國共產黨團結一致地堅持着社會主義事業，敵人的任何進攻就必然遭到徹底的失敗。因此敵人就必然要千方百計地破壞我們的黨，並把最大的希望放在中國共產黨的分裂和蛻化上面。這是任何一個具有革命政治常識的共產黨員和黨外愛國分子都能認識的真理。高崗、饒漱石等人正是在這種形勢下面結成了反黨聯盟，向黨的中央委員會首先是中央政治局舉行進攻，企圖推翻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久經考驗的黨中央的領導核心，以便奪取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他們的這種反黨活動無疑是適應了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的願望。他們實際上已成爲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